

## 從所謂「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

## 看鄧、胡體制面臨的挑戰

張京育

為期三天的第十一屆中、日「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已於本（一九八四）年四月一日在臺北圓滿閉幕。中日雙方學者近百人曾在會中就本題提出十篇論文並進行深入討論。本中心張主任京育則在其開幕與閉幕致詞中，對於中共的所謂「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以及鄧、胡體制面臨的挑戰，曾作精闢的剖析和簡明的結語，特併刊出，藉供參考。

編者。

## 一、開幕致詞

各位貴賓、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第十一屆中、日「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現在正式開幕，本人謹代表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和中方出席的同仁，向遠道來我國參加大會的學者、專家，致最誠摯的歡迎。同時，考試院劉院長季洪先生在百忙中蒞會作專題講演，國內政治、學術與傳播界領袖，也都抽空惠臨開幕典禮，本人在此，一併表示由衷的感謝。

中、日「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自民國六十年（一九七一年）底舉行第一次大會以來，每年輪流在東京、臺北兩地召開，每次大會都有一項客觀、明確的主題，與會學者專家們所提的論文，經過評論和研討後，不但對中共的黨政、軍事、經濟、文教與外交等方面的真相，能作深入的探究，對中共政權的未來動向，也往往作了正確的評估，而為事實所驗證，因此，本會議能獲得中、日雙方政府與民間一致的重視，並非偶然的，而是各位學者專家平時研究累積所得的代價，本人在此謹致崇高的敬意。

誠然，中國大陸問題是複雜的、多變的，尤其是中共的形式與其實質的表現，有很大的差別，使我們在研究時，必須採取謹慎細緻的態度，才能究明真相，但是，它也有單純的、不變的一面，正如日本前首相岸信介先生在上屆大會上所提出的：「毛澤東所扶植起來的權力慾和鬭爭體質，已成為中共不治的痼疾，同時也被今日鄧胡政權承續下來，使其內部呈現讓我們難以想像的

從所謂「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看鄧、胡體制面臨的挑戰

複雜離奇的權力糾纏」，岸先生所說的權力慾與權力鬭爭，就是中共政權不變的一面。

中共在鄧小平自一九七七年再度復出後面臨的問題相當複雜。主要是因思想路線左右矛盾導致政策上的搖擺，以及因長期極權制度造成經濟上的衰退，加上因暴力統治所產生的三倍危機等，都必須進行全面性的改革與整頓。於是，鄧小平提出所謂「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企圖以局部性的修正開放政策，挽救中共瀕於敗亡的危機。另一方面，中共領導階層的權力慾與鬭爭體質的因素，繼續存在，在無法脫離派系傾軋的情形下，鄧小平所採取的方式，仍以奪權為主，改革為副，也就是以整頓為名，而行排斥異己之實，所產生的結果，是繼續不斷的助長了派系的傾軋，反過來又阻撓了政策的推行，形成一種鬭爭——妥協——鬭爭的惡性循環，這也就是中共在政策上朝令夕改，反覆無常的根本原因。

至於鄧小平所提出來的「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究竟有什麼成就，我想在沒有聽取各位學者專家的意見之先，謹就下面幾點，提出個人的看法：

首先是經濟的成長問題，所謂「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的主要目的，在提高生產、增加國民所得，中共自「四人幫」事件後，曾經提出過幾套長程的經濟計劃，儘管目標一次比一次降低，但仍難有實現的可能。一九七八年二月，華國鋒在「五屆人大」一次會議上提出的「十年經濟規劃」，和本世紀末實現工業、農業、國防、科技等「四個現代化」的計劃，由於指標太高，不到一年，就被鄧小平一派批評為「冒進政策」，而告廢棄。一九八〇年一月，鄧小平提出新規劃，宣稱本世紀末「實現平均每人國民所得一千美元」，事隔一年半以後，一九八一年七月，他又改口說「到公元二千年，如果達不到一千美元，打個八折，達到八百元也就不錯了」。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日，「人民日報」又將指標降低為六百二十美元，到一九八三年「六屆人大」時，中共又宣稱「暫時不求高速，着重調整，以便日後起飛」，這一連串的事實，證明中共的經濟，始終在「調整」上兜圈子，而沒有「提高」的跡象，反過來說，也有人認為胡耀邦在一九八二年九月中共「十二大」時提出的「工農業總產值『翻兩番』」為本世紀末的長程經濟目標，亦是一種「冒進」的政策，而事實上沒有可能做得到。

其次，關於思想路線的問題，鄧小平要貫徹他的「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的政策，基本上必須修正毛澤東生前的教條，包括「階級鬭爭為綱」以及「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等理論，因而，思想路線上能否求得一致，是一個重要的關鍵問題。雖然，鄧小平設想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實踐論」，用以擊敗華國鋒一派「兩個凡是」的主張，並且解放了許多被整的老幹部，平反各項重大的政治案件等，而且經過中共「十二大」的召開，表面上鄧小平一派已有了鞏固權力的基礎，但是問題仍然成堆，沒有辦法解決，其中主要的問題有兩方面，一方面是因為黨風的敗壞而產生的幹部腐化；另一方面是因理論的分歧所造成的思想意識的紛亂，尤其是後者，因為思想意識的紛亂，而引發的「精神污染」問題，不但涉及到中共內部兩條路線的鬭爭與派系傾軋的問題，更因為「社會主義異化論」的出現，「三倍危機」的增高，直接牽涉到共黨理論與社會主義的根本否定，

這是相當嚴重的思想問題。反過來說，所以造成這種分歧的原因，似乎與鄧小平提出的「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不無關聯，因為鄧小平一方面為了搞活經濟，必須引進西方資本主義的資金、科技，才能迎合「四個現代化」的需要。另一方面，又恐懼西方的物質文明與民主自由的風氣，會產生對中共內部的衝擊，而影響到共產制度澈底的崩潰，因而，鄧小平在應付這項問題時，乃不願放棄已經破產了的「四個堅持」（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共產黨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同時，又不能不採取若干開放的措施，形成政治和思想方面「收」、經濟和對外方面「放」，亦就是「黨內反左、黨外反右」的矛盾政策，這或許是鄧小平對「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在理論上的自圓其說吧！當然，他的立論是相當脆弱的。

最近，日本出版的「選擇」月刊，曾經引述美國學者的一項研究報告，先指出「西方不應該擁有『中國』永遠採行社會主義體制之固定觀念」，假想中國大陸由社會主義變成非社會主義之各階段，然後提出各階段美國應採的「選擇」，對於此項看法，「選擇」月刊的作者湯淺誠先生認為中共是當前社會主義國家中最弱的一環，經濟基礎較蘇聯不穩，中共的黨亦較其他社會主義的政黨更為腐化，大部分的組織機能亦已失效，加以內部反對勢力的日益滋長等，「已有了非社會主義化的若干契機」，如果說，此種推測有部份理由的話，則鄧小平所提出的「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的前景究竟是如何呢？當中共想變而無法變，亦不能變的時候，會不會促使其內部權力鬥爭更加上升呢？中國大陸人民對於中共是否將產生更大的不滿呢？「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的想法與作法，對中共未來的經濟發展有什麼特殊的效果？在對外關係方面，是不是會對自由世界產生若干不良的影響？這些都是值得我們深切研究的課題，也就是當前鄧胡體制面臨的挑戰。請各位學者專家能在大會期間，交換意見，集思廣益，得出客觀而明確的結論，本人相信，這些結論一定有很高的參攷價值。

本次大會承日本綜合研究所桑原壽二先生和其他各位先生的大力贊助與支援，使會議得以順利的召開，本人不但欽佩桑原先生豐富的學識與修養，更佩服他為歷屆中、日「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所付出的辛勞，在此對桑原先生及其他各位日方代表敬表深切的謝意。

最後，謹祝大會的成功，各位先生身體健康，精神愉快。

## 二、閉幕致詞

各位貴賓、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本次大會的主題是「從所謂『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看鄧、胡體制面臨的挑戰」。過去三天當中，中、日雙方學者和來自韓國及香港的專家針對這個主題討論了當前中國大陸的黨政、經濟、外交及少數民族等方面的問題。本人非常感謝各位作者先生的辛勤，評論先生的細心，以及各位與會者的踴躍參與討論。同時，本大會並承中華民國考試院劉院長季洪博士及國立政治大學校

從所謂「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看鄧、胡體制面臨的挑戰

長歐陽勵博士分別在開幕式及閉幕式中致詞，使本次會議更增光彩。也在此謹致由衷的謝意。

一九七六年以來，中共面臨了許多挑戰。其中在思想和路線上最大的問題是，在建設所謂「社會主義」時，應該走那一條道路。經過多年的摸索，中共才提出「中國式的社會主義道路」做為掙扎求變的方向。什麼是「中國式的社會主義道路」？所謂「中國式的社會主義道路」與中共長期堅持的馬列主義有無矛盾之處？與會的學者都能針對這些問題，詳加討論。山村文人先生在論文中指出，中共所實施的一些政策如把計劃經濟和市場機能相互結合、促進產品的商業化、謀求改善停滯的經濟、停止過去的「政治掛帥」以及容許追求利潤等，都是些搞活經濟的變通辦法，稱不上所謂「中國特色」。趙先運先生在論文中表示，中共所謂「中國式的社會主義」，只是以「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為內容，披上所謂「中國式的社會主義」的外衣而已。其中還有許多做法尚在繼續摸索而無定章，或已經發動而正受挫折。吳安家先生在論文中亦指出，中共雖企圖找出一條「中國式的社會主義道路」，但仍舊跳不出馬列主義的框框。因為中共一面強調馬列主義本身受到時空的限制，無法用來解決當前中國大陸的各項問題，一面還堅持把馬列主義當做「偉大真理」。由此可知，中共所探索的這一條道路牽涉到範圍廣泛而且內容複雜的政治、經濟和意識型態等問題。直到目前為止，中共仍舊在嘗試和錯誤的過程中摸索着。今後，中共何去何從，仍將是中國、日雙方學者所共同關切的問題。本人願借這個機會提出兩點管見，就教於各位學者專家。

首先，吾人必須瞭解未來中共的一切改革過程中，黨所扮演的角色。如果負責策劃和執行各種改革的四千萬中共黨員無法根絕鄧小平所說的欺上瞞下、專橫跋扈、徇私行賄、貪贓枉法等官僚主義現象，中共的任何改革將難獲成功。誠如山村文人先生在論文中所說：「在一黨獨裁，握有統治和所有權的體制裏，雖是不徹底的改革，也會遭受行不通的情形」。

目前中共的整黨運動已由學習文件階段進入對照檢查階段。在這個階段中，中共提倡「談心活動」，迫使中共黨員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這種做法與一九五八年的「交心運動」相似。一九五八年，中共要求附共黨派和附共份子把心交給共產黨，現在中共則要求全體黨員把自己的心事和盤托出，俾能達到中共所謂「個人報病，集體會診」的目的。這種做法能否達到預期的目的，實在令人懷疑。根據目前的資料顯示，有許多中共黨員幹部對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還有思想顧慮。有的擔心自己檢查出來的問題會被當成整自己的「炮彈」，有的擔心給領導提了批評意見，領導會給他們「小鞋」穿。由此可知，中共整黨的阻力仍舊很大，這個阻力來自幹部本身。正如高田富佐雄先生在論文中所說：「這次的整風，本來是鄧小平、陳雲、彭真、胡耀邦、趙紫陽等『主流派』，為了清除『文革幹部』和『反主流派』黨員而發動的『權力鬭爭』。因此，其被整對象當然會想辦法『自衛』，至於未涉及有派系利害關係的大部分黨員，都不希望惹事生非，最後可能會變成『虎頭蛇尾』」。近來中共幹部間流行着「多栽花，少栽刺」、「作好好先生，多爭取選票」的順口溜，正顯現出共幹的「和稀泥」作風。

其次，在經濟體制改革方面，吾人可從比較共產主義的觀點來研究。列寧所推行的「新經濟政策」和中共的新經濟政策有那

些相同處和相異之處。雖然兩者的時空不同，但兩者都是在極左政策失敗後所採取的措施。列寧的「新經濟政策」的主要內容有兩個：一個是用糧食稅代替餘糧收集制，亦即農民完稅納糧後的部分糧食，政策允許歸農民支配，可以自由出賣。另一個是租讓制，亦即允許私人開辦小型工商企業，並將國家所有的某些企業、廠礦、資源，按一定條件由外國資本家經營或合資經營。這兩種做法，中共是否已加以模仿採行，值得進一步研究。根據一九八四年三月十九日，中共「國務委員兼財政部長」王丙乾在會見美國財政部長唐納·黎根時透露，到一九八三年底，中共與美國合資經營的企業已達二十家，美方總投資將近八仟伍佰萬美元，同美方企業家已經簽訂協議或正在洽談的各種形式的合作項目有：海洋石油開採、山西省平朔露天煤礦、山西省東南至江蘇省南通的輸煤管道以及在上海合作生產DC-19型客機等。今年三月二十三日，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訪問中國大陸時，同意在未來七年內貸款給中共四千七百億日元（約合美金二十二億），以興建七項工程。包括衡陽至廣州復線電氣化鐵路、鄭州至寶雞復線電氣化鐵路、秦皇島港丙丁碼頭建設工程、連雲港廟嶺二期工程、青島港前灣區建設工程、津滬穗三市電話網改造工程和天生橋水力發電站。同時，趙紫陽亦表示歡迎日本企業家到大陸投資，辦合營企業或獨資企業，甚至合作開發中國大陸西南、西北地區的煤、石油、有色金屬和稀有金屬等資源。為了長期獲取日本的資金和技術，中共還倡議與日本成立所謂「中日友好二十一世紀委員會」。這些資料顯示，中共正積極走到列寧走過的道路，那就是承認自由經濟的長處和吸收資本主義的好東西如講求效率的社會化大生產、經營管理和科學技術等。但是，為了取得資本主義國家的資金和先進技術，中共必須適時調整它的外交政策，也就是竺原正明先生在論文中所說的：「中共把對外政策視為推行其對內政策的手段」。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只想利用自由世界的資金和技術來武裝自己，並非對自由世界的制度和生活方式有了好感。為了說明中共的居心，本人在此引用大陸學者李樹藩評論列寧「新經濟政策」的言論，做為佐證。他說：

「租讓並不是同資本主義講和，而是新領域內的戰爭。它是利用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和外國資本家對資本和利潤的貪婪，在蘇維埃俄國工業發展落後，資金嚴重短缺的情況下，引進國際資本和技術力量，恢復和發展蘇維埃俄國的大工業，促進蘇維埃俄國的經濟建設速度，目的在於打破資本主義世界的封鎖，以鞏固蘇維埃俄國的地位。租讓制是一種手段，是在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共存期間，蘇維埃俄國在合理的條件下讓出一定的經營權，作為俄國從技術比較先進的國家取得技術幫助的一種手段」（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日出版的「東北師大學報」）。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本人引用這段資料的目的，在於說明以任何先進科技或資金援助共產國家，將會養虎遺患。今年三月十八日，竺原先生曾在日本「世界日報」上撰文指出：「中共之所要求於日本的僅是對其『四個現代化』的經濟和技術援助。……中共正像一九二〇年代和一九三〇年代的蘇聯一樣，正在耐心等待有一天能夠展開毛澤東所主張過的世界革命」。這種言論並非危言聳聽，而是真知卓見。

總之，一個極權主義的政黨，同時掌握着整個社會的政治和經濟資源，又不向人民大眾負起任何政治責任。自然其所推動的任何改革都將以不危害該政黨的統治權為其限度。到目前為止，中共整黨整風之所以未收效果，其所推行之政策之所以左右搖擺不定，以及中共之繼續鎮壓人民大眾自由、民主及基本人權的呼喚，再再說明中共極權主義的本質及其改革調整的局限性。就其對外政策來說，誠如中華民國考試院劉院長季洪博士在開幕典禮講演中指出：中共近年來雖因內外情勢需要調整了外交策略，但是它無法成為自由國家的真正朋友。這一點，我們只要細閱現行中共黨章，就可發現中共對國際事務的基本立場仍然是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而寄望所謂社會主義事業在全世界取得勝利。在中共黨人的心目中，共產主義與自由制度顯然是不能長期並存的。今後，我們對中共的本質及內外政策的演化自應繼續密切注意研究。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第十一屆中、日「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現在圓滿閉幕。本人再度感謝各位貴賓、各位女士、先生的出席，祝福各位身體健康，從海外來華的學者專家旅途愉快。

## 中共問題論集

郭華倫著

全書收錄有關中共問題之論文或報告計三十二篇；諸如中共黨史問題、中共的戰略策略與暴政及中共問題研究方法等，均有所評析，廿五開本，約卅萬字，四二六頁，全一冊，實售新臺幣一〇〇元（國內郵購每冊另加郵掛費十二元）。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編印  
郵撥：三四三六號帳戶